



昔我往矣

白先勇 著

中华书局

白先勇
著

昔我往矣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昔我往矣/白先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1
ISBN 978-7-101-11254-2

I.昔… II.白… III.散文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593 号

主编 刘绍铭 颜纯钧

书 名 昔我往矣
著 者 白先勇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00×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 1/4 插页 8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254-2
定 价 46.00 元

[代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白先勇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谢安问诸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答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的文学观于我心有戚戚焉。从前念《诗经》，念到《小雅》这几句，总有说不出的感动，一种不胜今昔的沧桑之感。虽然《采薇》写的是长征在外的戍卒，年老解甲返乡，途中哀思。但最后这四句，用以比喻人生过程，亦是一幅由春入冬最完整的时序图。昔日年少，初上征途，放眼皆是柳色青青，而今归来，两鬓如丝，纵是衣锦还乡，漫天雨雪，能不“我心伤悲”？

这个集子收的多为一些怀人感事的忆旧文章。很年轻的时候便染上“怀旧”的习惯，而常为人所诟病，然而我生长的那个乱世浮生，“过去”是如此的彩色缤纷而又沉重如山，为“过去”造像已感时不我与，也就无暇顾及“现在”，更遑论“将来”。尤其近年来亲友纷纷凋零，更令我产生危机感，要尽快将“过去”的一些片断，用文字固定起来，不让我对亲友的记忆，就此消失遗忘。至亲好友的亡故，不仅带走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也斩断了我与他们共同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年纪愈大愈感到寂寞的由来，因为有共同记忆的人，竟一一离去。“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两句惊心动魄的杜诗，至今才深解其意。

姚一苇先生曾大力支持《现代文学》，参与编务二十年如一日。从前每次返回台湾，我与姚先生总要谈论这本杂志，谈得兴高采烈，永不厌倦。即使《现文》停刊多年，我们每次见面，提起它，姚先生依然深情如故。自从姚先生逝世后，这些年，我已很少提起《现代文学》，因为再找不到像姚先生那样，谈到《现文》就情不自禁的至友了。集子里有好几篇都是回忆当初创办

《现代文学》的文章，那时候我与一批同学文友，大家正当青春焕发，写文章，办杂志，推动文艺思潮，勇往直前，不知天高地厚。回想当年憨勇，不禁莞尔。算算那已是四十年前的旧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导言]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刘绍铭

(一)

白先勇还年轻。虽然近年来文章发表得不多，但我们知道他的写作从没有断过。到时机成熟，新作发表时，想必会带来另一回“白先勇热”。

香港有识之士当然知道白先勇是《台北人》的作者。香港电台给他做过特辑。电视节目《百万富翁》的题目中，亦用上他一篇小说的题目。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白先勇另有辉煌的一页。他是《现代文学》(下称《现文》)的创办人。1959年暑假，

他跟台大外文系几个同班同学，决定筹办一本以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发表本土新生代作家作品为宗旨的杂志。

白先勇弄到一笔十万元的基金（当时电影院的票价是十元）。因只能动用利息，他只好拿钱到一家铁厂去放“高利贷”。谁料杂志办了九期，这家公司倒掉了，十万元的本息，也全泡了汤。

除了为钱烦恼外，《现文》这位白董事长还要身兼杂差。组稿、跑印刷厂，都包在他身上。

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

多年后，白先勇回顾台大四年，觉得最有意义的事

就是创办了这本编辑无薪酬、作者无稿费、在财政上一直命若游丝、却多次死而复生的文学杂志。他倒说得对：“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

60年代初，台湾还有一本广为文艺青年重视的杂志：《文学季刊》。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陈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都是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的。

《文学季刊》和《现代文学》同样以发掘和培养文学新秀为宗旨，只是编辑方针略有不同。前者注重创作，后者除刊登创作外，还兼顾西方文学评论和作品的译介。《现文》的创刊号，就是由王文兴筹划的卡夫卡特辑。

当时在台湾的“土秀才”，即使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也没机会读到他的中译作品。后来《现文》继续了这个传统，先后推出了乔伊斯、托马斯·曼和福克纳等大家。

大概由于这个编辑方针的关系，也因杂志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作者译者几乎清一色是台大外文系的穷学生，

日后论者为了便于识别这本刊物异于同类的风格，常常会把《现文》目为“学院派”的“地盘”。

这有点冤枉。“学院派”确属事实，不能抵赖，但“地盘”却谈不上。稿费也发不出的刊物，哪有资格划地自封？最近重读白先勇《不信青春唤不回》一文（1992年），谈到他初遇今已作古人的三毛的经验：

1961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溜达，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到我来，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

十六岁的三毛，正是小毛头，跟学院沾不上边。由此或可看到，《现文》实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二)

《台北人》早成中国近代小说经典，里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顽艳”者不少，绝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的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铁石心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作品中看到任何痴男怨女的旖旎风光。
花好月圆人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想呆了。

我在台大比白先勇高一班，蓦然回首，跟他论交也有四十年了。他为人豪迈爽朗，极重情义。20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看到他在《现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台北人》系列小说，心中暗暗吃惊，糟糕，温润如玉的白公子，怎么变成了用“忍情”的专家？他笔下四季穿着素白旗袍的尹雪艳，“冷艳迫人”。白先勇的小说语言，也一样“冷艳迫人”，一点不像我们平日认识的浊世佳公子说话的口吻。

白先勇写小说，作者的“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用笔名发表于《现文》的创刊号。

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看了，觉得玉卿嫂写得很“圆熟”，不像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白先勇听了得意，连忙招认是他写的。

玉卿嫂是谁？在《蓦然回首》（1976年）一文中，白先勇有分教：

有一年，智姐回台，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的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戴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

区区一对白耳环，想多了，就变成了一种“蛊惑”，一种艺术的心理负担。写《玉卿嫂》，就是要化解这种负担。白先勇的“自我”与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台北人》系列，有不少篇章是跟民国史脉络相承的。《岁除》《梁父吟》和《国葬》是显例。白先勇是将

门之后，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可能曾经一度是对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们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机“自伤身世”，则容易流于滥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观性。

我们细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难发觉，作者笔触冷静得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说人物保持一段艺术的距离。

白先勇在小说艺术上获得非凡的成就，靠的当然是他个人的天分和日后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这方面，他台大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及时给他扶了一把。

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的书，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的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

文字有时也染上了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这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

(三)

白先勇的创作类型，一直是小说。他可能写过新诗，或剧本，但我没有看过，亦没有听说过。他没“刻意”写过像朱自清《背影》那类的散文。所谓“刻意”，就是非常“自觉地”写散文，像梁实秋、像余光中、像董桥。

但白先勇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不少是以随笔或序跋形式发表的散文。写小说，他“六亲不认”，前面说过了。在散文字里行间出现的白先勇，有血有泪，坦坦荡荡。

《树犹如此》是纪念亡友王国祥之作。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百医罔效。1992年1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白先勇提议到一家海鲜酒家给他庆祝，谁料恶疾到了末期的王国祥，蹬不上通往酒家的那二十多级的石阶，只好作罢。两人回到王国祥家，煮了两碗阳春面吃。

星期天傍晚，我要返回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的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

白先勇写随笔，信手拈来，不少日后可作文坛史话。他的小说系列，除《台北人》外，还有《纽约客》。下面一段出版《暮然回首》的记载，可作《纽约客》的缘起看：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 Little Carnegie Hall (小卡内基音乐厅) 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内战，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

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地激动不能自己。走到外面，时代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离家的彷徨。

离家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宋明话本的说话人，好站到台前来向听众“言志”，说三道四。今人写小说，引此为戒。白先勇迷恋昆曲，到了情痴的地步。《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白先勇对昆曲海誓山盟的符号。但他没有以小说言志。他对这一派演艺的认识，日后以随笔《惊变》（1987年）曲曲传出。他在上海看了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回来吐了心声：

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辞藻

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不读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寻根随笔，不知他的远亲“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始祖是伯笃鲁丁公！这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贡献可大。李白“大概”是回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概”也是。我在岭南大学的同事马幼垣亦“大概”如是。

白先勇说，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天下无双。

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